

军统

档案

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军统

● 整合权威档案资料，
● 全景揭示军统内幕，
● 再现血雨腥风的惊悚时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统档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军统 / 朱韞，时攀编.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9
ISBN 978-7-5057-2778-6

I. ①军… II. ①朱… ②时… III. ①军统局 - 史料
IV. ① 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1875 号

书名	军统档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军统
编者	朱韞 时攀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规格	710×1000 毫米 16 开 17.75 印张 21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778-6
定价	3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第一章 揭开军统的神秘面纱 / 1

第一节 走进中国现代第一特务组织 / 3

第二节 特务是怎样炼成的 / 14

第三节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 24

第二章 军统在各地的活动片段 / 35

第一节 繁华上海的军统 / 37

第二节 陪都风云 / 50

第三节 军统天津站 / 59

第三章 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 / 73

第一节 对红色政权的罪恶活动 / 75

第二节 军统和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区、西南区的较量 / 89

第四章 戴雨农的军统生涯 / 99

第一节 军统生涯前的历练 / 101

第二节 中国的希姆莱——戴笠 / 109

第五章 对第三势力的特务活动 / 123

第一节 “经典”行动——暗杀杨杏佛、史量才 / 125

第二节 “国母”遭忌 / 136

第三节 “李闻惨案”背后的故事 / 144

第六章 抗战时期军统的秘密暗杀任务——抗战大锄奸 / 151

第一节 抗日杀奸团始末 / 153

第二节 枪杀张敬尧，斧劈唐绍仪 / 160

第三节 誓杀汪精卫，诱捕陈璧君 / 170

第七章 军统三巨头 / 179

第一节 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 / 181

第二节 蒋介石的侍从官唐纵 / 191

第三节 郑介民其人 / 201

第八章 内部权力的角逐与更替 / 213

第一节 戴笠之死 / 215

第二节 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方斗法 / 225

第九章 最后的暗杀名单——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 / 235

第一节 蒋介石下达暗杀令 / 237

第二节 一封南京来的电报 / 242

第三节 蒋介石一念之差，李宗仁捡了一条性命 / 247

第十章 大江东去，一去不复返 / 253

第一节 恶名昭著，改头换面 / 255

第二节 血腥毒辣的罪恶活动 / 262

第三节 慌乱破坏渡台湾 / 267

第四节 在台湾的日子 / 276

第一章

揭开军统的神秘面纱

第一节 走进中国现代第一特务组织

提起特务，大家眼前就会呈现一个个电视屏幕当中的特务形象，但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还是这样一个名字——戴笠。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被大家称为“军统”。“军统”就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特务组织。但在最初，这现代中国的第一特务组织并不称作“军统”，那么，它是怎样演变的呢？

一、刚刚起步——“军事委员会密查组”

1927年7月，蒋介石在政治上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4月12日国共合作分裂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与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形成宁（南京的简称）汉（武汉的简称）对立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也开始反共清共，并主动提出宁汉合作。但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是与他争夺国民党领袖地位的强敌，拒绝合作，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满，蒋介石因此陷于被动地位。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矛盾爆发。桂系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后又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了南京政府，因此自认为出力颇大，不肯对蒋介石称臣。蒋介石看到桂系日渐坐大，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认为当时蒋、桂力量已不相上下，无必胜把握，加之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颇好，不愿立下杀手，执行此项计划，蒋何关系也日趋恶化。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介石的计划后，遂加紧联合各方的反蒋势力，准备寻机对蒋发难。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之下，蒋介石决定加强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桂系及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部队的忠诚情况。于是，当年7月底，在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部成立密查组，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经胡向蒋推荐，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为该组成员。该组任务除了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以加强蒋介石对嫡系第一军及杂牌部队的控制外，还兼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情况，以作掩护。

这是蒋介石成立最早的一个准特务组织，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特务组织，后在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复兴社特务处，才算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特务组织。

二、发展阶段——复兴社特务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震撼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人员被殴打。同年10月底和11月初，爱国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其他大员无法招架，蒋介石只好利用蔡元培这块老招牌来应付学生，结果连蔡元培也被学生殴打。蒋介石到他的国民政府去，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不能脱身，被迫无奈，才肯站出来对学生讲话。他装腔作势地满口抗日，说马上发枪给学生，要求学生参加军训，把南京孝陵卫（明孝陵是朱元璋的寝陵，守卫他寝陵的部队称为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住，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用这个办法总算为自己解了围。然而这只是蒋介石一时的欺骗应付，稳定不了整个动荡的形势。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他不得不把屠刀暂时放下——把“剿匪”的军事行动停止下来，把反共的口号收藏起来。这时的蒋介石，坐在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上感到惶惶不安，处心积虑，苦心焦思。当然他所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他想学习、运用苏联对反革命作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就是所谓的政治保卫局）来为他的反革命目的服务。于是就在1932年，就由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了青年军官团体，以寻求某种能够使行政机构听命并使党恢复生机的力量，这个团体也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蒋介石亲任社

长，下设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复兴社虽然在完善间谍业务和开展阴谋破坏的同时，还有包括逐渐渗透到卫戍部队、警察和军警力量中去的任务。然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没有以合法形式布置下去。虽然蒋介石规定，所有的人事事务都得由他亲自处理，但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他也刚刚被逼下台，政府大权当时是落到了广受尊敬的名义领袖林森手中，所以在当时，蒋介石的这个秘密特务组织确实徒有虚名，连执行其基本职责的权力都没有。

虽然如此，但“复兴社”还是有自己完善的组织。其下设：“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作为领导机关。由刘健群、酆悌、康泽、桂永清、杜心如、郑介民、滕杰等任中央干事会干事。由周复、戴笠、孙常钧、胡轨等任中央监察会监察。还设有中央常委干事会，有干事九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在“两会”之下还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由戴笠任特务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不久以后，蒋介石重新上台，特务处就成为了国民政府当中的一个比较正式的机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特务处已经完全脱胎出来，成为一个地道的特务组织。后来又经过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到1932年时，这个特务处已发展到100多人，各组织基本构建完成。1933年以后，特务处还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区以及各省站。在内勤机构方面，股升格为科，先后设立了书记室、情报科、司法行动科、总务科、电讯科、交通科等机构；科内设股，仅情报科内就设有华东股、华中股、华北股、西北股、华南股、国际股、统计股等，并逐步向日本、朝鲜、美国、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家派出情报人员。“复兴社”规模的持续扩大，为以后“军统局”主持大局打下了基础。在改组成为“军统局”之前，特务们引以为豪的是1935年彻底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委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使得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但结果却不是他们想要的。也正因为这种孤立，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情况下，能够自行其是，积蓄力量，取得并形成了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实际领导地位和新的乡村战略，并最终战胜了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们。

作为国民政府的秘密团体，“复兴社”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国民党特务系统中还有以“CC”系分子为骨干、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成立的一个调查科——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的前身。由于复兴社和调查科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向，所以从开始建立以来，复兴社和“CC”系这两派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两个派系的斗争使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左右为难。同时，也因为这些斗争，复兴社和“CC”系各自的工作开展也时有冲突和矛盾，这样就降低了它们的功能和效率。于是，为了缓解两派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蒋介石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整合两派，组成了著名的第一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三、揭开面纱——“军统局”

1935年4月，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和避免复兴社与“CC”系的明争暗斗，于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将两派统一起来，由陈立夫当局长，把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编为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原中华复兴社特务处编为第二处，戴笠为处长。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内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两派的利益冲突依然很尖锐，蒋介石只好让两派各自发展。所以在1938年，蒋介石又把原有军统局撤销，将原来的第一处扩充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将原来的第二处扩充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为新军统，由原来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任局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是贺耀组，所以由他兼任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上由他负责主要工作。军统设在四川省重庆市中二路的罗家湾，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给戴笠，又由于戴笠本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第六期），蒋介石想要提拔他，又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只好叫他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所以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贺耀组、钱大钧、林蔚，都兼军统局局长。这些人也了解蒋介石

的意图，更懂得戴笠的为人。所以，这些局长都从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等，全部工作由戴笠一手包办，并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4月1日，军统举行“四·一大会”，即纪念1932年特务处成立而召开庆祝大会与工作会议时，兼局长才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所以戴笠的脑子里根本就不重视这些所谓的局长，而一般外勤特务更不知道还有什么局长，都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戴笠刚把军统局接收下来时，原特务处的副处长郑介民，只好被安排为该局主任秘书，等于原特务处的书记长，原有的情报、行动、司法、电讯、总务等科也都统统改成了处。

军统局还在各地设有办事处，有自己的独立的武装和训练机构，由其内勤单位直接领导的附设机构，有特务总队、集中营、特别侦察组、外事侦察组等。除此之外，军统局自己还有种类划分细致的特务系统，这些特务大致有三种。一是秘密特务：搜集情报的直属情报员、直属通讯员、义务情报员、运用情报员、搞行动破坏的行动员、运用行动员、搞交通联络和电讯的联络员、报务员、电讯监察员、电讯侦测员、密电码破译员。二是武装特务：抗日战争时期称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国民党逃往台外后，保密局和情报局把武装特务改为“反共救国军”。三是公开特务：是以警察名义和其他公开名义为掩护，如警察局、交通警察总局、各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各绥靖公署第二处、各驻外使馆武官、三军的联络参谋等等，军统局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统局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大名鼎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由此可见“军统局”分工之细，也可以看出“军统局”的控制的大致情况。

随着抗战的继续，军统局的组织和系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动。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军统局的组织越来越庞大，在原有的基础上组建成了八处。

第一处军事情报处，简称军事处：处长鲍志鸿。主管搜集军事情报和扩大军统武装力量。下设军事情报科、军运科、策反科，以及主管派在各部队担任谍报

参谋工作的谍参科。

第二处党政情报处，也称政治处：处长王新衡。主管政治斗争，负责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下设中共科，叶翔之兼任科长。设党政科，王方南任科长，负责搜集各民主党派的情报，派员监视各党派人员的活动。设国际科，负责对外侨和回国华侨的调查、监视与接待工作，以及搜集日汪有关情报等。还有侦防科、航检科等。

第三处行动处：处长先是徐业道，1942年是阮清源，1944年是沈维翰，1945年是程一鸣。下设行动、警稽等科。主要任务是根据一、二处提供的情报，执行暗杀、密捕等任务。

第四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主管军统电讯工作。设有技术研究室，专门研究有关特务技术。

第五处司法处：下设审讯科、狱管科。

第六处人事处：处长先是李肖白，后是龚仙舫。下设人事行政科、考铨科、福利科、卡片室。主管人事、组织工作。

第七处经理处：处长徐人骧，副处长郭旭。下设统计、审计、预算、财务等科及现金出纳股。负责向军需处领钱。

第八处总务处：处长原为杨隆祐，后为郭斌，1943年是沈醉。下设庶务、管理、交通三科，并领导汽车大队、电话队、农场、官兵消费合作社。

另有训练处：处长郑锡麟。主管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训练工作，并主编军统局出版的《家风》月刊，及领导各大专学校内的职业特务学生和一个从华北撤退到四川的大专学校中作特务活动的“抗日锄奸团”，之后在这个组织上稍作了一些改动，但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分成三种不同的地区：第一种地区是解放区；第二种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三种地区是沦陷区。军统局在以上三种地区进行的活动各有不同。

对解放区，军统局采取进攻破坏的方式，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渗透破坏。在陕西省的榆林、汉中设有两个派遣组，专门负责派遣特务的活动。军统局还配

合国民党军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线上设立封锁站，截留从陕甘宁边区进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胁迫他们当中的动摇分子充当特务。1938年春张国焘由延安叛逃，投靠了军统局充任“时事研究室”主任，专门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还为军统局出谋献策，妄图把解放区的军政干部拉出来，充当特务。在解放区的周围，军统局的秘密组织配合国民党军队修筑了五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实行军事、经济的封锁，向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妄图打下延安。

在黑暗反动的国民党统治区，军统局采取镇压群众的方式。军统局的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双管齐下，镇压革命运动，破坏革命组织，严密管制人民，各省市的警察局都加强保甲制度，管制户口。军统局控制下的交通检查所，检查水陆交通工具；航空检查所，检查飞机的运输和乘客；邮电检查所，检查人民的邮电往来，监察各种秘密电台的通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军统局竭力破坏一切革命运动，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囚禁、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实行法西斯统治。

另外，军统特务在敌伪侵占的沦陷区，采取和敌伪勾结，宁渝合流的方针，派遣特务到南京、上海，和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秘密联系。军统局的武装特务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名义上是在沦陷区打游击，实际上和敌伪军勾结在一起，妄图消灭新四军。京剧《沙家浜》就是表演忠义救国军当年在江苏省昆山、常熟县阳澄湖一带和敌伪军勾结，进犯新四军的罪恶事实。

当然，“军统”在抗战期间也从事了一定的抗日活动。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而隶属“军统局”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为稳定局面，有意拉拢有影响的中國上层人物出面组织所谓的“临时政府”。经过一番斟酌后，日本人选中民国初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唐经反复考虑后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晚节不保。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着令“剪除附逆”。1938年，就在唐绍仪接受邀请出面组织“政府”后三个月，潜入上海的“敌占区行动组”的

军统特工便除掉了他。在随后的时间里，军统局还先后策划了对殷汝耕、季云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刺杀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并未完全成功，但无疑有效地震慑了投敌叛变人员。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机人员无一生还。随即蒋介石任命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由于军统特务远远超过了原有的编制，开支更大大超过规定的经费，郑介民和毛人凤都认为无法维持那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决定缩编裁员。这样，才使得过去戴笠只准进不准出的规定被打破。

在军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由于郑介民和唐纵分别任帮办、毛人凤任主任秘书，这不同籍贯的三个人及其各自的坚定的拥护者逐渐演变成了军统局特务系统的三大派，使得军统内部原本就存在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构，各方面的力量都希望能早日撤销。在这种局面下，如果还继续保留“军统局”，就必然使国民政府陷入困境。于是，为避免使自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对“军统局”进行了改革。

四、逐渐衰弱——国防部保密局

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

戴笠生前，一来是因为局势对蒋介石还不像后来这样坏，二来是蒋介石对戴笠也比较放心，所以对于特务机关的事，蒋介石“躬亲”的时候不多。然而随着后来形势的愈加不利，蒋介石也愈来愈指望其特务机关能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因此自然就对军统局比以前更加用心了。所以，在“军统局”改为“保密局”之后，蒋介石一再亲自出马对上层成员“训话”，一再集体或个别地接见派往各地去的省站人员，为他们指示打气，希望他们多多拼命。而在这个时期，毛人凤

为了争取表现，巩固其黑暗“事业”，就特别卖力。他一方面仍学戴笠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在局本部与副处长以上人员一起吃饭，一起谈问题，以期增加效率。在和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也保留“军统局”过去的成例，每月约集宪兵司令、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保密局成立时在南京马台街22号办公，1947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不久以后，毛人凤又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马路上，弄了一幢房子，取名“诚庐”，作为各特务单位首脑开会之用。毛人凤还规定：各省站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务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够取得更多的联系，同时还规定各省站站长每月至少要召开一次“公秘会报”（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关负责人的会报），轮流报告各单位工作，然后汇报到保密局。

在保密局时期，保密局所能控制的公开机关已不如“军统局”时期那样多。而在被控制的机关中，由于权力之争的加剧，其负责人也不如“军统局”时期那么听话。当时，最大的公开特务机关恐怕要数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所管辖的警察总署。唐纵因为自己是老“军统”，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和运用，但实际上也在搞他自己的一套活动。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的机关是交通部全国交通警察总局，这个局的成员，大都是原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和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的人马，基本上还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的王兆槐，平汉的朱若愚，津浦的吴安之，陇海的程一鸣，胶济的贺元，粤汉的张辅邦，湘桂的史铭，滇越的田动云，都是“军统局”老特务。公路方面：公路总局之下的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处、运输处的警稽室，也都由“军统局”老特务控制。交通警察总局的二十多个交通警察总队，也全是由原属“军统局”指挥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而成的。由此可见，保密局的人员配置明显不如过去的“军统局”。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公开机关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这在郑介民以保密局长兼第二厅长的时期，还不成问题。后来郑被免去保密局长和第二厅厅长兼职，由副厅长侯腾升任厅长后，便不愿受保密局的控制。侯腾还

想把原来在第二厅的“军统”特务排挤出去，一手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分庭抗礼。毛人凤因为自知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第二厅，但又不肯放手，只好暗中指使留在该厅的“军统”成员，继续与保密局保持工作关系，并设法与侯腾捣鬼，甚至到逃台之前，侯腾和毛人凤都还在勾心斗角。

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军统”从抗战胜利后便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部倪超凡、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等等，都是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也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地的稽查处，在保密局时期也一直没有放过手。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不但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非常有利，还从可用“合法”面目从事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方便。

在保密局的外围组织中，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充起来的。当时，戴笠的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会以及各地的流氓组织统一起来，归他自己领导，以加强“军统”的外围力量。被邀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王晓籁、向松坡、杨虎、张啸林、范绍增等近百人。1946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筹备成立大会时，各路人马均赶去参加，曾被认为是当时的一个“盛举”。戴笠死后，这个组织由“军统局”大特务徐亮负责，但是徐亮已经组织不起来，尤其是在发展组织时，更是遭到“CC”系分子等各方面的攻击与阻挠。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组织之后，对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会起操纵作用，从而对他们的派系不利，这个会才在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失败，军统局只能退出大陆统治，逃去台湾。这样，由于形势的变动，军统局在对大陆的特务活动区域和方式方法上产生了一些改变。到了台湾，当政者也只能顺应趋势，对保密局进行一些改动。

五、退出大陆——国防部情报局

蒋介石撤逃台湾后，从未放弃反攻复辟的幻梦，他一直强调：“对大陆布建工作应依次以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地方为当前派遣重点，并应确实控制鹰厦铁路，欲控制鹰厦路，须先控制浙赣路”。

而此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毗邻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增设间谍站组，对新成立的政权形成了弧形的间谍特务包围圈。刚好给退出大陆的蒋介石集团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了合作机会，为此，美、蒋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的策划支持下，整顿强化间谍特务系统，形成由蒋经国指挥的特务体制。1954年10月，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国家安全局”，蒋经国以“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身份领导“国安局”，由该局督导“中委会二组、六组”、“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1955年3月1日，将“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将“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和“内调局”以及“保安司令部”的部分特务单位并入该局；又将“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部调查局”，统归“国安局”督导。先后由毛人凤、张炎元、叶翔之任局长。